

吴汝纶与书院教育改革

梁艳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 100029)

摘要:吴汝纶是晚清学者、教育家,为推动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吴汝纶在担任地方官员期间筹经费、延名师,着力经划书院。他在主持莲池书院时期对书院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虽然吴汝纶的教育实践与思想脱胎于传统教育,始终重视传统经学,但他对传统教育的不足和学习西学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在书院内开设英文学习班和东文学堂就是他推行近代教育的早期尝试。吴汝纶的这种转变在晚清这个社会制度转型期非常具有典型性,其力行的书院改革也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组成部分之一。

关键词:吴汝纶;书院教育;教育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6-0090-07

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中,教育近代化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具有先导性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先后涌现出一大批有识之士,有教育家,有思想家,也有政治家,或者几种身份的合一,他们都为中国近代教育做出了或多或少的贡献。吴汝纶就是其中的一位。吴汝纶字挚甫,又字至父,道光二十年(1840年)出生于安徽桐城高甸刘庄,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同治二年(1863年)开始应试,每试必中,当年中县试第一名、府试第二名、院试第一名;次年中江南省乡试第九名举人;又次年入京会试中第八名进士、以内阁中书用;同年(1865年)入曾国藩幕府,从此步入仕途。“少长以文章见知于曾文正公,遂从曾公受学”^{[1]1139},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号称“曾门四弟子”。吴汝纶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教育模式下走出的成功的典范(至少在当时看来是如此),但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深厚传统文化背景的人,后来却成为一个思想开放、“兼综中西”、主张学习西学、借鉴外国教育经验变革中国传统教育的人,并为中国近代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清儒学案·挚甫学案》称:“自望溪倡古文学法、刘姚继之,桐城一派遂为海内正宗,绵延二百年,而挚甫为之殿;海通以来,中国屡受外侮,识时之士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强,挚甫尤喜言西学,异乎拘墟守旧者也。”^{[2]484} 吴汝纶的这种转变在晚

清这个社会制度转型期非常具有典型性。从为官一任、兴学一方,到主讲莲池书院,从热心于传统教育到批判科举取士,从对西学的肤浅认识到主张“取资外国新学”改革中国传统教育,从孤立的教育活动到对整个中国近代学制体系的思考,他的教育实践与思想始终处于不断的近代化转变过程中,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本文拟从书院教育入手,通过对其教育实践的阐述、研究,以窥其教育改革思想之一斑。

一、经划书院教育

深受“陶铸人才以移风易俗”思想的影响,吴汝纶在早年为官期间特别注重地方教育。从同治十年(1871年)出任直隶州深州知州,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辞官,吴汝纶先后做了17年的地方官(其间曾因丁忧短期去职)。在此期间,他投入精力最多、成效最大的政绩,非教育莫属。在吴汝纶看来,义学办得再好,其最高成效不过“略识之无,稍记名姓”,而造就成材,必须依靠书院教育,二者“利害较然,彼此悬绝”。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把经划书院作为治理地方教育的主要目标。除了处理日常政务外,“则尽心整顿书院,培养士人,欲化其朴陋之习”^{[3]15}。

(一)裁并义学,以资书院

京津一带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遭兵火肆

收稿日期:2020-07-01

作者简介:梁艳玲(1978—),女,山东烟台人,教育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编审、副社长。

虐,破坏严重,经济凋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教育更是陷入停滞状态。吴汝纶初到深州时州治书院因经费缺少而“几于废弛”,“山长束修,不足供脂袜之资,生徒膏火,不足偿纸笔之费”,以至于“科第愈益稀少,风气愈益朴陋”^{[3]478},民间义学更是有名无实。对于这种现状他非常忧虑,决意“诱之上进,激励奋兴”。要重新振兴书院教育必须宽筹经费,当时书院田产生息几乎荡然无存,而“劝捐输,查废产”又行不通。与此同时,吴汝纶也发现另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民间义学管理非常混乱。道光年间时任深州知州张杰曾利用查收的废产兴建了一批义学,后来又驱逐僧道,添设义学至二百四十五处之多,使“党庠家塾遍乎四野”。这原本是有利地方教化的一大盛举,但因当时没有详细、统一的规制,都是民间自行简料,以至于后来“散无友纪,查检难周”。有的村民甚至伪造地亩、学舍册籍,虚应官令,而实际上村内并没有设立义学,遇到上面检查就借私人家塾,指为义塾,或者让村内长老冒充塾师。到了吴汝纶任知州时,义学已经积弊丛生,尚未废坏的义学也是“先生据案,未必识丁,弟子入塾,有如点卯”的状态。看到这种情形,吴汝纶当机变通,请示上级官长,要求核实稽查义学田产,分别裁并:对于地亩较多而规制未坏者,酌留数处;地亩少,经费不给者,则数处并为一处。同时对学生入学条件和塾师资格做出规定,即“必子弟聪颖,读书可成而无力延师者,方准送入义学,仍由考试书院时录取寒士,以为之师”^{[3]479}。这样通过裁并义学,一些废坏难复之学的学田和久为豪民霸占的学田都被稽查在案,而这些田产的地租则尽归书院。“如此一转移间,义学弊窦渐除,可冀徐收实效。书院经费素裕,必能大振士风”^{[3]479},可谓一举两得。但义学在当地存留也有数十年的历史,而且很多被地方豪民霸占着,裁并有很大阻力,“一旦尽与改革,奸民无能侵牟,固且怨黯横起,即有读书晓事之人,亦将震于义学美名,不能卓然无惑”^{[3]480}。吴汝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所以在具体实施时采取分别裁留的形式,不“行之过骤,操之过急”,谨慎是吴汝纶行事的一贯作风。经过努力,这次裁并义学,共括出废弃学田一千四百多亩,而且还追回豪民拖欠二十余年的书院生息款五千多两,全部充书院经费,“厚给师生,广置书籍,而书院以兴”^{[1]1139}。他自己也颇以此为荣,在日记中写道:“余在深二年,愧无绩状,惟查学之废者并其产于

书院,厘定章程,稍有裨益,到任时书院岁入三千余串,卸任时乃六千余串。”^{[1]388}

(二)延名师,聚高材

在筹款充实书院经费的同时,他还想方设法为书院聘请名师。他遴选书院教师的标准虽然说是“究以帖括为主”,但从他先后为冀州信都书院选聘的几位山长或者教授来看,都是在经史、文辞和实学方面有专长的人,而在举业方面倒不是很注重。光绪七年(1881年),吴汝纶欲聘正在保定畿辅通志局任分纂的王树楠^①为信都书院主讲,写信给总纂黄彭年,请其允让。黄彭年闻之大怒,坚决不准,而且在回信中“语多讥讽”。黄彭年的态度使吴汝纶感到有些意外,他说:“鄙事迭费精神,感纫无极,寿翁来书,颇含怒意。此事小子无礼,岂敢妄有触犯黄丈,黄丈天下事岂不容商量邪!”^{[4]63}于是吴汝纶再以书请,辞极和婉,但黄彭年还是坚持不允。这似乎惹恼了吴汝纶,遂上辞职书于李鸿章,说:“某作官一无所长,惟整顿学校,为国家造就人才,尚堪自信,今求一山长,而不得行其志,尚何面目尸此位乎?”^{[5]548}当时李鸿章方遭母丧,所以请署督张树声代为和解,最后达成协议,王树楠保定、冀州各住半月,一面继续修志,一面主讲信都书院。这样,为书院聘请名师的任务算是完成了,但吴汝纶和黄彭年的关系也因此而破裂,“二人自此水火矣”。由此可见吴汝纶为聘名师主讲信都书院之不遗余力和发展地方文教之决心。后来为聘请范当世^②、贺涛^③也都费了很多周折。贺涛当时为直隶大名郡学使,因格于官例,不能出任冀州书院山长,吴汝纶为此特别请求上级官长,将贺涛自大名调署冀州学正,这样才有贺涛的冀州之行。贺涛后来官刑部主事而仍兼讲席,前后共18年,成就也非常大,“北方学人对之极推崇之盛,谓继吴挚甫先生而后之第一人。主

①王树楠(1851—1936),新城(今河北省高碑店市)人,字晋卿,号陶庐老人,与吴汝纶有师徒之谊。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历任四川、甘肃等省知县、知州、道台多年,官至新疆布政使。1914年入清史馆任总纂。王树楠对文字训诂、新疆舆地、欧西历史均有研究,一生著述颇丰,有60种之多,民国《冀县志》为其地方志代表作。

②范当世(1854—1904),通州(今江苏省南通市)人,字青堂,又字无错,别署伯子、诸生。师事张裕钊,学古文义法,同时受教于吴汝纶。所作散文属桐城一派,后经吴汝纶推荐,入李鸿章幕,为其子李经迈老师。著作有《范伯子先生全集》等。

③贺涛(1849—1912),武强(今河北省武强县)人,字松坡。贺涛为吴汝纶之后桐城古文派的主将,与范当世齐名,有“南范北贺”之称。同治九年(1870)中举,光绪十二年(1886)成进士,任大名郡学使。光绪十五年(1889)殿试授刑部主事,后袁世凯聘主保定文学馆。

讲冀州书院久，其门第遍燕南北，蔚为北方大师”^[6]。

除了为书院遴选名师，他又聚所属五县之高材秀生，使之就学于书院，求贤师而教之。此外他还广纳贤士，将其罗致于身边，每月在书院聚会一次，“议所施为兴革于民便不便，率不依常格”^[7]¹³⁴⁴³。他们还参与书院的考课，“每校士之期，此数十人者，毕来论学议事。略尊卑之分，泯主客之迹，黜彼我之见，翕然欢然不知其孰为官，孰为士，孰为宾师也。而生徒执业其中者，亦相与维系如一家，各以所闻见传播乡里，故其时冀属多善政。习俗为之一变，而吴先生亦尝以得人自喜”^[8]³³¹。

吴汝纶为官时不仅自己注重教化，而且也积极支持下级官员这样做。当时冀州武邑县令郑筠似兴复武邑书院，吴汝纶为了不使其半途而废，打破“摄县率以一年为限”的惯例，为之“请于大府”，留君三年，以竟其事，使“自初迄终，经画井井，于是武邑之俗大化”^[9]¹⁴³。

经过吴汝纶的不懈努力，深州和冀州的学风大振，教育有很大起色，以致“深冀二州书院，遂为畿辅冠”^[1]¹¹⁵³。他自己也说：“数年以来，殊无治状，惟有书院筹增经费万余金，招名师教授，选其少年俊才，使在院肄业，士风稍振。”^[3]⁵²⁵⁻⁵²⁶

二、主讲莲池，成绩斐然

光绪十四年(1888年)，尚在冀州任上的吴汝纶得知莲池书院山长一职有空缺，遂上书李鸿章，请求辞官以赴讲席，第二年二月二日卸冀州任，二十五日即抵保定莲池书院，出任山长，一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被张百熙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主持莲池书院达十三年之久。

书院水平的高低、名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院长的人选。莲池书院自创办后，先后在此担任院长、教授、主讲者有不少文化名人，但由于庚子之厄，莲池书院的文献典籍或被焚毁，或散佚，所以自书院创立至咸丰初年，其历任院长大多已无可考稽。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至光绪末年，在吴汝纶之前先后主讲于莲池书院的名士有章学诚(邃于史学，以纂志为时人所重)、祁韵士(精于治史，长于地域、中西交通之学)、黄彭年(朴学、修志)、何秋涛(于经史小学无不研究，尤精于地理学)、李嘉端(讲学认真，得第学生最多)、王振纲(博学多通，后乃潜心研究性理)、张

裕钊(研究训诂专主音义，擅长书法，工桐城古文)。在这期间，莲池书院学风随着院长的个人特点不断变化，由章学诚、祁韵士、何秋涛时期的经世致用到李、王时期的专主举业，黄彭年又提出“化乡酬世”的办学目标，而张裕钊则“日以高文典册磨砺多士”。作为莲池书院最后一位院长，吴汝纶不仅从教时间最长，而且在书院教授和管理方面有自己的特色。

(一)“为教一主乎文”

吴汝纶教学中最大的特点是“为教一主乎文”。《清儒学案》称：“(摯甫)为教一主乎文，以为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国所独优。”^[2]⁴⁸⁴他生于时称“天下文章所归”的桐城，“自少读姚氏书”，成年后又以文章名世，这决定了他对文章的重视。桐城古文向来重“义法”，“义”即“言有物”，“本经术而依事物之理”，就是要符合程朱理学规范，但世人一般认为桐城派于程朱理学没有太高深的发展，他们更重视“法”，即古文写作的程式、法度、规模等，讲求文从字顺(重音韵)。

但吴汝纶之所以重文，在更大程度上是从“文”与“道”的关系上来看的。所谓“自古求道者必有赖于文，而文章与时升降”，而且“圣人者，道与文固并至，下此则偏胜焉，少衰焉”^[9]⁵²。在文与道的关系上，他列出了三种可能，并明确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凡吾圣贤之教，上者道胜而文至，其次道稍卑矣，而文犹足以久；独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9]¹⁴⁸“圣贤之道寄于文，古无所为而漫言道者”，虽然道是实质，文是形式，但如果没有好的“文”作为载体，再有价值的“道”也不能长存。因此他把写好文章看成学习的一个重要任务，曾对外甥王子翔说：“学有三要：学为立身，学为世用，学为文词。三者不能兼养，则非通才。非奉教贤哲，刻苦求进，不易成也。”^[3]¹⁰⁷桐城古文自清代中叶在文坛上崛起后，长期具有很大势力，但到后来那些可供遵循的写作原则和技法成了束缚写作的条条框框，使桐城古文变得日益平庸，落入俗套。曾国藩出于“修道立教”的需要，曾对桐城义法进行了一番改造。吴汝纶作为桐城派末代宗师，则指出：“说道说经，不易成佳文。道贵正，而文者必以奇胜。”^[3]⁵²一言切中桐城古文的要害——平庸无奇。他还继承了韩愈等人以“气”论文的传统，把“才”“学”“气”的关系作为评价文章的标准。他认为“夫文章以气为主，才由气见者也。而要必由其学之浅深，以觐其才之

厚薄”^{[9]359}，所以相对于“宏肆”“驰骋”之文，他更欣赏“醇厚”“笃实”之文。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他特别推崇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这本书可是说是桐城文派的经典之作，是古文写作的典范，而不是经学、道学的教科书，吴汝纶对它的评价非常高。他说：“因思《古文辞类纂》一书，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以为《六经》后之第一书。此后必应改习西学，中国浩如烟海之书，行当废去，独留此书，可令周孔遗文绵延不绝。”^{[3]231}他把此书作为仅次于六经的必读书，不但经常向他人推荐，还向朋友求购康刻版本，请求“用黔蜀有绵性之纸，印甘部见赐”，以分惠子姓、传散徒友，可见其对桐城古文的偏爱。他还写有《古文辞类纂点勘》四卷，认为“姚选特入辞赋门，最得韩公论文尊扬马本意。而《楚辞》至为难读，因颇发其旨趣著于编，用质后君子。……欲治文事者，倘亦有取于斯”^{[9]174}。

但他也承认文体是不断变化的，各个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如他所说，“汉氏多撰著之编，唐宋多集录之文”，“其体虽变，其要于文之能工，一而已”，可见他看重的是写文章的艺术和技巧，而不一定必须以桐城古文的文体来写。

（二）“因文以求其意”，开创治经新路

吴汝纶不但治学没有门户之见，而且还继承了曾国藩更化创新的学术特点，从汉宋两学派治经的缺陷出发，独辟蹊径地开创了一条“因文以求其意”的治经新路。“窃谓古经简奥，一由故训难通，一由文章难解。马郑诸儒，通训诂不通文章，故往往迂僻可笑。若后之文士，不通训诂，则又望文生训，有似韩子所讥郢书燕说者。较是二者，其失维钧。”他还指出：“唐宋文人，于六经能抉摘隐奥矣，其所短则古训失也。朱子于理学家独为知文，其说得失参半，又其文事未深，故古人微妙深远之文，多以后世文字释之，往往不惬人意。我朝儒者鄙弃其说，一以汉人为归，可谓宏伟矣，唯意见用事，于汉则委曲弥缝，于宋则吹毛求疵，又甚者，据贾、马、许、郑而上讥迂史，蒙窃未之敢信。……乾嘉以来，训诂大明，至以之说经，则往往泥于最古之诂。而忘于此经文势不能合也；然则训诂虽通，于文章尚不能得，又况周情孔思邪！”^{[3]615-616}在他看来，汉宋两家未能真正彻底地通晓经文，归根到底都和不通文章或“文事未深”有关，所以把“通文章”提到重要地位。吴汝纶是持“道以文传”者，他认为治经之人不通经文，自

难晓经文所论之“道”，而精于文章者兼通训诂和义理不是难事。作为桐城派的“古文宗匠”，吴汝纶在文章上自然有着毋庸置疑的优势，所以他治经也比较有特色，用他的学生贺涛的话说就是“因文以求其意”，这是汉宋两派经学家都没有走过的治经途径。正因为此，所以读吴汝纶的文章，有两种感受最深刻：一是他文章内容旁征博引，“无古今，无中外，唯是之求”，“自六经诸子百家传记，以逮国朝著述，与夫儒先遗闻绪论、断简零章，无不博求而慎取也”^{[1]1130}；二是他的文章“醇而肆”，不但文思缜密，而且气如流水，“渊涵淳泓，浑无涯涘，上与元气者侔，而下与万汇相昭列”^{[1]1130}。

吴汝纶和张裕钊同出曾国藩门下，又是情意颇深的挚友，而且同宗桐城文派，二人先后执教莲池书院将近二十年，重文的风格一脉相承，他经常鼓励学生练习写作，精心批改、指点，并刊刻成《学古堂文集》二卷，激发了学子写作的热情，使莲池书院形成了浓厚的文学氛围，也培养出一批“词章蜚声”的门生，如贺涛、傅增湘、高步瀛等。

（三）破旧立新，大胆改革

吴汝纶担任院长时期还对书院的办学和管理方面进行了改革。第一，在保证生源质量的前提下放宽入学限制。书院每年在正月招收新生，考生无须具备秀才资格，也没有省区、籍贯的限制，凡通过入学考试合格者即予以录取。第二，招生不受定额限制。由于书院面积较小，通常仅能容纳四五十名学生住宿学习，因此存在一些走读生，这些走读生与住院生享有同等的听课权与考试权，不仅可以来院听讲，而且可以参加每月一次的考试，奖励待遇与住院生相同。第三，改革考试制度。过去由五大宪（即对总督、布政使、按察使、清河道员和知府的统称）分别做主考官、轮流拟阅卷的官课和由院长主持的斋课均采用开卷，也没有考试时间的限制。到吴汝纶时，他将斋课改为严格的闭卷考试，规定二更前必须交卷，还亲自监考，使学生的拖延、抄袭之风得到遏制。同时允许不在书院著录的士子报名参加各类考试，名列前茅者也可获得奖励，待遇同本院生员。这种开门考试的办法，使书院教学影响远远超越了它的藩篱之限。第四，加强奖励机制。每次考试优胜者分列一、二、三等，依次给以奖赏。原先奖银很少，斋课每次考试共奖银八两，官课随轮值主考

官之意而定,为数也不多。吴汝纶出任莲池书院山长不到三个月就上书李鸿章,请求其宽筹经费,每年增奖银一千余两。在奖银的分配上,他尤其侧重对古课的奖励,第一名一次就可以获得10两的奖励。官课和斋课的考试内容一律是默写《四书》《五经》的章句,并写八股文章和试帖诗各若干篇、首,这实际上是针对科举考试所进行的模拟测验,而古课则是由院长出题考试经史策论。吴汝纶重奖古课而不是官课和斋课,可以看出相对于经史之学,他并不太重视举业的学习。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不重举业,但是在书院官学化的时代,位于畿辅重地的莲池书院不可能完全抛弃举业,而且国家选拔制度并未改革,科举仍是大多数士子求学的目标,所以吴汝纶也狠抓时文教学,不仅严格斋课考试,而且编写时文教材用以教初学者。

重文的学术风气,灵活的办学机制,使吴汝纶执教的莲池书院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吸引众多学子前来就学。民国时,王兰荫在《河北省书院志初稿》中对吴汝纶在直隶的兴学与从教情况评论说:直隶之书院,“其流弊则教材教法,纯受科举制度之支配,以帖括为主,学多无用。惟深冀二州书院及保定之莲池,因桐城吴汝纶挚甫之提倡主持,独具特点”^{[10]154}。

三、尝试新式教育

意识到传统教育的不足和引进西学的重要性,当时还是莲池书院山长的吴汝纶就开始了近代新教育的早期尝试,在书院内首次开设了英文学习班和东文学堂。

(一) 开设英文学习班

吴汝纶认为中国不能老是“窳守旧术”,必须重视新学,熟习各国政治,“始能宏济时变”,以御外辱,所以他非常提倡书院学生学习西学。学习西学,除了看翻译的西学书籍和报纸外,如果能掌握一门外语将更能获益。但语言不同于其他学问,吴汝纶认为学习一种语言必须以此种语言为母语的人为师,如学习英语必须以英国人为师,学习日语必须以日本人为师,而不能跟日本人学英语。1898年吴汝纶听说有一位叫贝格榘的英国人在保定居住,于是便与之联系,在保定书院内开设英语班,并传授西学。当时在书院内开设英语班可以说全国也只有莲池一家,虽然预定只招收20名学生,也颇费了一番周折。吴汝纶为此动

用了以前做地方官时的一切关系,广泛宣传,多方动员。首先宣传学习英语的好处,其次为那些犹豫的人家算“经济账”:“中国之学,往往费数十年之力,而不能必成。西人语言文字,期以五年无不成者,五年之内,所耗束脩止一百余金,五年之外,即可大发财源。本小利大,莫过于此”^{[3]233-234},自己率先送儿子入学以为表率。这样,在他的积极努力下,莲池书院的英语班终于得以开课。

(二) 创办东文学堂

在开设英语班之后,吴汝纶又着手创办东文学堂。他创办东文学堂的原因有三:一是东文较西文易学,且教习易聘,聘金也比西文教习少;二是西书一般都有东文译本,通晓东文就可以博览广学;三是日本离中国近,中国学生将来赴日研习专门之学不是很难,而且花费较少。他请求李鸿章之子李经迈(季高)代为疏通,从淮军公所岁脩之费的存款入息中每年提取四百金,作为东文学堂的办学经费。因此,此学堂名义上专为安徽籍子弟所设,畿辅诸生如有愿意附学者,可以出少量束脩,以资补助,“惟皖人则不须别筹束脩,庶冀寒家易于从学”^{[3]255}。至于东文教习,则聘其学生中岛裁之。中岛裁之于1891年来到中国,1898年拜吴汝纶为师,“其人于东学、西学皆已卓立,而中学亦甚可观”^{[3]255}。后来中岛因在日本办理同文书院,所以不能主持东文学堂,又聘野口多内(张裕钊的学生)继续担任教习。吴汝纶还为东文学堂制定了学堂章程:“入学以五年为限,至速亦须三年”;实行班级授课制,“同学二三十人,皆应合班受业”;“以中学人执一业,进止可以自由,东学则同班共读一书,先后不可参差也”^{[3]275-276}。学生中学、东学兼习,课堂上则只学东学,以半日为限,一般是下午上课,上午各生仍自归本家讲习中学。但学堂宗旨以东学为主,虽然中学和东学各占半日,但如果有“资性平钝者”,白天所学东学不能完全掌握,晚上必须温习;“本日未熟者,次晨仍应温习”,“不得拘定半日中学,致令东学疏旷”^{[3]276}。

在书院内开设英语班和东文学堂,此举在当时曾引起封建顽固派的非议和责难,但吴汝纶不惧这些非难,并以此为荣:“保定一城,由下走开成东西二学堂,并不甚多费,颇以此自喜。”^{[4]147}不仅如此,他还鼓励莲池书院学生赴国外留学。在吴汝纶的主持下,莲池书院的盛名远播海外,更

多日本学者如学家梅原融、本田幸之助、上野岩太郎、金子弥平等或以文章求教,或亲来书院学习交流。

(三)力推新式学堂

吴汝纶自入仕以来,一直在京津一带活动,但他仍然非常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先前为了白鹭洲书院学田一案,几乎费尽了心血,多方联络,寻求支援,前后几年,最终算是争回了书院应有的学田,保证了白鹭洲书院的经费来源。

戊戌变法以后,吴汝纶多次写信给当地官绅,以当时危急的国情相敦促。如他在给当时主持白鹤峰书院的李与仙、柏松如二人的信中说:“科举改制,国家注意西学,策论取士,亦决不能久。昨读上谕,天下书院尽改为学堂,民间社学、义塾,一律讲习西学。风气大变,吾皖尚沾沾守旧,不能作新人才,此大患也。”^{[3]196}他动员他们适应时代的变化,讲求西学,将书院改为农商学堂,三年之后,必有成材可观,“高可以为国效用,下亦可以为乡里致富阜财”,“使愚者智、穷者富”,“实救时之良策”也,较之埋头于无用之策论课卷,“其奏效之孰虚孰实不可以道里计矣”^{[3]196-197}。后来戊戌变法失败,“朝局一还旧贯,时文复用”,慈禧太后一道“书院照旧办理,停罢学堂”的懿旨颁布下来,处于萌芽中的教育改革戛然而止。时局的不稳使很多人丧失了改革的信心,或尽复旧制,或相互观望、停滞不前。而吴汝纶此时仍力主改革,认为恢复时文考试“于长育人材实有妨碍”。“缘后生朝夕揣摩此业,即无余暇可以兼习他学,不惟西人艺术,不获窥寻,即中国文史,亦复不遑探讨,无以造就成才。……且时局多变,后生为学,若不问津西国,终难成有用之才。”^{[3]216}所以他写信给家乡的柳博泉侍郎,希望他与同乡诸公“熟筹妥商,贻书当轴,再申前议,添筹经费,开倡西学”。当时戊戌变法失败,全国上下呈现一片复古景象,吴汝纶此时继续促动改书院为农商学堂,足见其眼光之长远、改革信心之坚定。

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第一,在这个时期,吴汝纶基本上仍是在传统教育思想的指导下从事教育实践。他筹集教育经费的途径、遴选教师的标准以及主讲莲池的教学内容和办学方针都没有能够冲出传统教育的樊篱。第二,他不遗余力地为地方教育办实事,兢兢业业执掌莲池书院,也为畿辅地区学风的转变和人才的培养做出了贡献,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第三,吴汝纶并非循规蹈矩之人。从他的治学态度来看,不仅无门户之见,而且还敢于开创新的研究途径,有着明显的开放性特点。第四,他在传统书院内率先开设英语班和东文学堂,标志着他迈出了近代教育改革的第一步,虽然只是短暂的尝试,但客观上也为他以后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乃至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埋下了伏笔,同时也为莲池书院较早改新式学堂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 [1]吴汝纶.吴汝纶全集:第四册[M].合肥:黄山书社,2002.
- [2]徐世昌.清儒学案:第一八九卷[M].北京:中国书店,1990.
- [3]吴汝纶.吴汝纶全集:第三册[M].合肥:黄山书社,2002.
- [4]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辑[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 [5]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2卷[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 [6]潜山.再谈以往的莲池[J].河北月刊,1937(3).
- [7]赵尔巽,等.清史稿:第四百八十六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8]贺涛.贺先生文集:第四卷[M].北京:朝华出版社,2018.
- [9]吴汝纶.吴汝纶全集:第一册[M].合肥:黄山书社,2002.
- [10]赵所生,薛正兴.中国历代书院志:第一册[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